

西方英雄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关系

○ 季 文

(安徽新华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71)

[摘要]近现代以来,西方英雄与英雄主义一道来到中国。我们需要从他们是如何给历史带来正能量这一方面去探讨其中思想的关联。作为个人主义的表征——西方英雄主义,其嬗变的本质是个人主义追求安全有序社会环境的发展过程。本文从西方文学作品出发,分析总结西方英雄主义母题的特征及个人主义价值观对英雄母题的影响,可以说,西方英雄主义发轫于个人主义,又为个人主义的发展打开局面。积极地理解西方个人主义,有利于辩证看待中国社群主义。

[关键词]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

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以强大的文化价值观对东方世界不断进行着激烈地精神冲击。西方英雄主义随之来到东方,来到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西方文学作品就可以验证这一点。不容否认,在近现代中国接触到的西方英雄主义,不论是文学读本形象,还是电影文学形象,不论是历史学家的叙述还是哲学家的阐释,给中国人追求民主、科学、革命与人民的福祉带来了正能量。但是,当这些英雄与英雄主义同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与英雄豪情交相辉映时,不免给当代正在转型的中国人带来一些思考:东西方的英雄与英雄主义究竟有些什么共同本质和不同特质,我们怎样去认识在各民族的民族斗争、民族革命中,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各国人民进行资产阶级性质或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中涌现的英雄们,从而在这些认识中弘扬一种健康的历史文化价值,去怀念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本文试从西方英雄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哲

作者简介:季文(1982—),安徽新华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与外国文化。

学关联这个角度去寻求这方面的答案。

一、西方文学作品中个人主义价值观下的英雄特征

卡莱尔将英雄史观作了纲领性宣言：“可以公正地说，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就是英雄的历史。”^[1]他将英雄的定义和评价总结为：“世界历史是人类所取得的种种成就的历史，实质上也就是在世界上英雄的历史。他们是民众的领袖，而且是伟大的领袖，凡是一切普通人殚精竭虑要做或要想得到的一切事务都由他们去规范和塑造，从广义上说，他们也就是创造者。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成就，本是来到世上的伟人的内在思想转化为外部世界的结果，也就是他们的思想的实际体现和具体化。可以恰当地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精华，就是英雄的历史。”^[2]欧洲的英雄史诗分前期和后期，不同时期所衍生出的英雄母题也不相同，可归纳出以下几个主要母题：

1. 奥林匹克式英雄。法国学者丹纳曾经说过，希腊人将健美的人体敬奉为偶像，在地上颂之为英雄，在天上敬之如神明。古希腊文化孕育出的奥林匹克式英雄母题，是对个人形体、外表、力量的关注，是个人主义中外形价值的体现。荷马史诗中，天上的神灵、人间的英雄都拥有健美的体魄。孔武有力，英雄埃内阿斯不敢迎战阿基琉斯，是由于后者的“每块肌肉如同青铜铸成”，他心甘情愿认输。无论是在荷马人还是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健美的肉体具有神灵一样的崇高地位，是神祇的另一表征。他所体现出的力量既代表着神圣的神力，也是来自于心灵的超自然力。

2. 原欲型英雄。原欲型英雄母题更多地关注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追求自然生存的基本需求。在很多文学作品中，这种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体现在诸多英雄形象上。希腊神话中，英雄都是神祇和人类的后代，因此，他们也都有着人的七情六欲和基本生活需要。这些英雄们神性有余，人性更足，个人主义价值观是他们的行动指归。于是，个人思想的局限性也得以体现，如尚武思想的推崇，英雄们把血腥的战场当作展示其英雄品格、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以大规模地杀伤对方来显示自己超人的武艺、胆魄与智慧。这些英雄都传递了一个共同信息：英雄并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符号，而是血肉丰满、有着每一个正常人都存在的一切欲望的世俗个体。

3. 尼采式英雄。这是充满权力意志、反叛的个体，从不放弃属于自我的权利。文艺复兴标志着个人主义不再满足于生存需求，对权力的渴望也逐渐加强。文学作品中英雄们基本都是与社会相抗衡的。海明威在《太阳照样升起》中塑造的杰克·巴恩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一度沉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认为所谓的“光荣、神圣、牺牲”所代表的传统道德都是荒谬可笑的，这是个人意识试图反叛传统的第一阶段。拜伦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塑造的英雄哈洛尔德以远游的方式叛离资产阶级创造的不安全社会，《曼弗雷德》中的曼弗雷德认为罪或无罪只是“自我”的事，“自我”是绝对自足，毫不用他物相助，无论是上帝还是

恶魔,最后独自背负所有的罪孽,以毁灭的方式——死亡表示永不屈服的意志。甚至生活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成员都不满所处的环境,挺身而出,约翰·麦考利小说中的佐罗形象就是个例子。加州在脱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加入美国联邦之前,最后一任总督拉弗尔采用高压独裁的统治方式,令百姓苦不堪言,于是贵族狄亚哥便用蒙面侠的身份来对抗暴政,“佐罗的传奇”由此诞生。英雄们在劫富济贫、锄强扶弱的过程中,反叛烈火燃烧不息。

4. “反英雄”式英雄。所谓的“反英雄”概念与“英雄”相对立,在文学作品中反英雄是个矛盾体,一方面,他们是传统英雄母题的反面、对立面,形象多面目可憎、行为常偏离常规,具备着不属于传统英雄的不良特征。另一方面,他们是特定情景下的英雄,有着崇高的理想和强大的力量。这类英雄母题是对现实价值观的“证伪”,展示着人们对传统道德观的质疑、个人主义的张扬和传统英雄母题的衰微。德国启蒙作家狄德罗在其哲理小说《拉摩的侄儿》中塑造了既卑鄙又高尚、“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拉摩的侄儿这一“反英雄”式英雄形象。作为统治阶级的帮闲,他低三下四,任人作践,同时又坦率耿直地鄙视、揭露上流社会的腐朽。可以说,拉摩的侄儿集愚蠢与才智、卑鄙低劣与光明磊落为一体。恩格斯称《拉摩的侄儿》是一部“辩证法的杰作”,马克思称之为“无与伦比的作品”。自此,“反英雄”式英雄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开始流行起来。如《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第十二条军规》中的尤索林,他们明确地意识到自我与周围社会环境的对立,试图摆脱困境获取自由,最终都无法实现愿望,这些英雄最后不会让自我意识消融在对自我厄运的内省中,更无法以宿命论的态度接受厄运,而是强调个性的张扬,反抗控制自我的外在力量。有些反英雄式英雄以自我为中心,骄傲自大,过分执著于财富、地位、复仇,如《呼啸山庄》中的希斯克里夫,一个捡回来的孤儿,被世俗的等级观毁灭了他的爱,于是,爱变成了强烈的恨,进而成为残酷无情的报仇阴谋。还有部分反英雄式英雄受到不可控制的外在力量的影响,被卷入与英雄对立的困境。他们会表现出和普通人一样的焦虑、惊慌失措,甚至是恐惧,所表现出的情感比传统英雄的完美形象更贴近生活,显得真实而富有感染力。如《哈利·波特》小说中的西弗勒斯·斯内普,为了心中所爱,冒着生命危险,用谎言周旋在伏地魔和食死徒之间,西弗勒斯·斯内普守护着自己的信仰,却成为没有爱人、朋友、孤独而阴险地活着的“英雄”。

二、个人主义价值观下西方英雄主义嬗变原因探析

马克思认为:“个人发展经历三大阶段,原始社会形态下,个人通过狭小的层面依靠救世主生存;第二阶段是以物质为基础;第三阶段则是建立在个人主体与社会共同生产的自由个性之上”。^[3]这三个阶段恰恰符合西方古希腊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与现代三大时期的特征。从现实层面上说,西方英雄母题嬗变现象下的本质是个人主义实现其追求安全有序社会环境的过程。

从个人主义历史渊源出发,最早可追溯到传统的基督教精神。《圣经》在肯

定神性的同时强调个体的创造性。它一直秉持个人通过自我的不断认识、肯定、追求与完善就能够到达象征理想的“神的彼岸”。亚当、夏娃所犯的“原罪”通过努力也能获得救赎。正是这种可改变现实的意识激励着西方人不停地进行自我认识、自我奋斗、自我发展,形成了强烈的“个体”意识,衍生出诸多英雄人物,为西方个人主义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原始社会的现实秩序处于原始状态,人类在长期生命活动的实践中,通过对自然界的不断认识,最后终于从自然中分离了出来,以自然人的姿态站了起来。普罗米修斯盗火的英雄行为“作为理性的开端”,起了里程碑的作用,标志个人意识的觉醒,说明人类从“无意识的存在升华到了人的水平”。然而,英雄普罗米修斯所受到宙斯的惩罚,被钉在高加索山上遭受的痛苦象征着人类为实现自我的主体精神所面临的困难。《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竭力逃避神谕所示的命运,本质上是个人觉醒意识的勃兴,从自然人开始向社会人过渡,反抗意识也日益明显,来自于自然外力之外的社会阻碍更束缚了个人力量,俄狄浦斯的结局也标志着人类追求自我的艰辛。诗人承认命运存在的同时,谴责命运的邪恶,赞颂个人永不屈服的斗争精神。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是英雄的聚集所,其体现出的英雄主义为了当时个人主义想要宣扬的思想、追求的目标担当先锋、主力军。在不发达的古希腊时期,社会环境处于野蛮阶段,正如霍布斯对现实所描述的:“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因此,古希腊时期的个人主义处于满足原始欲望的阶段,神秘莫测的大自然未能转化成服务于人的力量,人类处于原始的形象思维,感觉生存的恐怖,为了存活,个人的独立自主意识正在逐步觉醒,追求灵肉并重、神人势均力敌的英雄理想体现了当时个人主义价值观。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所衍生出的英雄主义主要为了与自然、命运相抗衡,不惜牺牲自我,唯以暴力、战争以求实现、获取有序社会环境的权力。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大都源于为了争夺个人所需的、有限的物质生存材料,个人原始的生存欲望超越了所有道德、伦理的羁绊,人的利己本性在生存意念上完全释放,个人强健的力量、战争上无畏的战斗和竞技场上英勇的角逐必然成为每个人为获取物质财富、个人荣誉的唯一手段,通过战争还能获得更伟大的成果——建立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的主动权。文学作品中的英雄特征主要体现在追求孔武有力的外表和实现个人生存欲望方面,这些都是发动战争达到目的的充要条件。伴随着战争的延宕,雅典后期“亚西比得综合征”泛滥,个人主义盛行的最终结果是为了政治权势。^[4] 在古希腊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英雄伯拉西达于战火中拿下了城池安菲玻里,最终战胜雅典人,换取 50 年的和平条约,史称《尼西阿斯和约》,用战争开创了一段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综合来看,奥林匹克式英雄母题是个人主义初期追求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的先决条件,而原欲型英雄母题则是个人主义实现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目标下的现实子目标,也是英雄主义为了达到最佳号召力对人类大众的许诺。

到了中世纪,人类倾向依靠救世主,好容易站立起来的个人主体意识又匍伏

在以上帝为代表的宗教脚下,上帝完全主宰了人类精神,成为他们的行为指归,个人主义失去自主性。在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后,打着上帝旗号的教皇、国王们,尤其是宗教所宣扬的禁欲主义,扼杀人的本性,以救世主的名义控制人们的精神,竭力去掩盖、甚至抹杀人智与科学,愚昧地将人类的进步交由上帝去完成,唯上帝论让个人主义在上帝面前枯萎,英雄主义进入历史上的衰退时期。以神权、王权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自欺欺人地认为社会正按照他们所希望的状态维持下去,没有正视平静的社会秩序下不断汇集的个人主义力量。在基督教义极力鼓吹上帝全能的同时,现实生活中的事实证明上帝是无能干预现实的,在现实层面上埋藏了个人主义反抗的导火索。思想层面上,随着文艺复兴带来的人本主义思潮,个人个性、欲望不断寻求解放,每个人急于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对君主权力开始质疑,国王地位开始动摇,人们急于挣脱传统价值、理性规范的束缚。18世纪末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席卷了整个西欧,以宣扬个性解放为旗帜,继法国兴起之后,西方其他国家也积极跟随,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俄国、北欧等国都相继爆发了浪漫主义运动。文艺复兴的目的就是要发掘个人的本性及存在的价值,相应的文学作品也由此展开。但丁的《神曲》正是个人主体精神和自我意识走向“天堂”,个人人性完善的过程,同时所经历的痛苦与反抗,被后人称为对《神曲》两重性的解释。薄伽丘的《十日谈》高调倡导个人的本能要求、情欲的美好,莎士比亚对个性的崇高概括为“个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个人对自我认识更为深刻、细致和具体。人本思潮与现实社会秩序的矛盾,促使人类急于向上帝索取个人的尊严和个性的自由。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霍桑的《红字》中的普通人类都是与宗教的虚伪、封建强权统治相抗争的英雄,歌颂人性中的真、善、美,追求人性的发展。19世纪,爱默生的思想“上帝在我心中”宣扬了“人就是一切,世界因为人而存在”,在人与神的关系中,个人是主体,而上帝则退居其次,成为客体,使人性得到极大的张扬。由此可以看出,上帝的形象越来越人化,上帝的世俗化、平凡化反映出人类将上帝从信仰的殿堂拉了下来,个人主义发展蓬勃的历史事实。文学作品看到了这一事实并对其进行艺术加工,尼采式英雄母题就秉持了这种现实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不仅包含对神祇、王权专制统治的质疑,也预言了个人主义在英雄力量的号召下必将胜利。他们追寻自我价值,英雄们不断挖掘自身的身心特质,使个人意识形态的基本逻辑和个人主体对社会话语权的渴望得以充分的表达,充满了权力意志、反叛的个体从不放弃属于自我权利的追求。巴尔扎克现实小说中就出现了诸多尼采式英雄,如芜特冷、拉斯迪额、马尔宾和吕崩柏礼,他们一直宣称“只有获取权力,才能获得别人的注意”,这一母题揭示了有序安全的社会秩序还是靠个人追求权力、创造财富来推动。

个人主义代替神本主义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然而,社会为此转变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到了20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建立,远不如启蒙主义者所鼓吹的美好,对权力、财富的一味追求使人类感到理想破灭后的失望,随着对上帝信仰

的缺失,王权权威遭到质疑和颠覆,传统的宗教道德失去了约束力,同时却没有有效的约制力来替代,人的自然欲望和冲动肆无忌惮的释放,急剧敛财、纵情声色,导致了道德的腐化、社会的无序。人性解放的同时,其消极的一面也引起了西方对社会精神的反思。个人主义强调每一个人发展的哲学意义受到经济市场的影响,在被金钱主宰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缺乏有效的精神约束,英雄形象开始衰微,个人主义中种种劣根性——自私、贪婪、偏执、背叛与物质高度发达但精神贫乏的社会现实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英雄们在人性解放的同时,感受到了迷茫与无措。如何发展自我、如何处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实现自我价值等等问题都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人欲横流、理性规范缺失的时代,人们沉溺于物质贪欲的追求、无节制的现世欢乐享受之中,欲望膨胀、道德失范、利己主义横行。这就推动了崭新的英雄母题的生发——“反英雄”式英雄,如金斯堡《嚎叫及其他》中以激进的方式展示出丧失理性后的个人主义成为“垮掉的一代”。海勒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借尤索林的话道出理性与信仰一齐消失后的迷茫:“每一个人都在拼命地捞钱。我看不见天堂,也看不见天使。”这种消极的影响本质上是由于个人丧失理性发展自我所陷入的精神危机,从而出现扭曲,最终导致人性泯灭。拜金思想给西方社会带来了信仰危机、文化危机,人性丧失,尼采在感受到上帝之无能、救赎之无果与人类之绝望后,喊出了“上帝已死”的箴言。英雄们就处在一个失去上帝,缺乏理性约束的时代,财富与权力使父女、姐妹、弟兄反目成仇,朋友背叛,正如哈姆莱特所感叹的:“这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英雄们感叹的是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下人性的茫然和个人发展的迷茫。在追求人性价值和物质的两难基础上,英雄们彷徨在高扬和衰微的路口。追求财富的社会中,个人的发展毫无意义,不过是累积财富的过程,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自我严重背离。因此,到了20世纪,西方文学都将迷茫的个人主义作为文学作品的主题。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个人从肉体到精神都变得没有存在的意义,面临被消灭的危险,人的发展更是无从谈起。由此可得出,个人主义单维度的发展并没有给社会秩序带来安全与有序。面对这种个人主义的式微,杜威认为致使个人主义价值观陷入此境地的原因在于:快速而一味地追求工业发展,忽视了与个人全面发展的和谐共处。杜威提出了“新个人主义”,以期挽救“失落的个人”,即“通过控制性地利用业已掌握自然界物质力量的科学与技术之全部资源”,^[5]让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实现与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相结合,在实践中重新塑造新的个人和实现新的个人主义。罗尔斯的《正义论》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形成了“罗尔斯产业”,他认为,“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唯有基于个人权利的‘社会正义’才能产生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和保障合理的社会秩序”。^[6]

三、辩证看待中国社群主义和西方个人主义,构建跨文化交际的和谐

关于个人主义,中国古已有之。孔子云:“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由己”

指的就是个体的自主性。除此之外,庄子思想中的“自得”“自善”“自适”等等,以及儒家哲学中“人的道德自主性”,都是对个人主义追求的体现。由于中国历史的原因,个人主义观念一直停留在心理层面,并没有上升至政治、法律高度。其次,中国传统伦理观来自儒家的纯粹利他主义,认为凡是利己的,都是有害于社会的、他人的,是不道德的,唯有无私利他的行为,才符合道德目的。从根本上否定了“单纯利己”“为己利他”,唯把“无私利他”奉为唯一准则。抵制了通过凸显个人主义来强调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它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区别可以说既是个人主义政治概念与哲学概念的区别,也是个人在追求高尚品德和充分发挥才能上的区别,西方个人主义认为,个人只有将自我才能发挥充分,才能有助于社会及他人,没有能力培养和约束的品质是无法发展、适应社会的,毕竟,道德的规定与约束是随时间、空间变化而不停改变的变量,只追求个人品质而忽视个人发展既无利于社会的进步,有时甚至会与法律相悖。个人自我独立、自我奋斗的执著精神,强调自信与个人利益,重视自我表现,追求独特的活力和创新意识才是永恒的价值。弗朗西斯·福山就对西方个人主义的强大进行了总结,“西方人把个人主义看作是一种近乎完美的品德,代表着创造性、开拓性、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不向权威屈服的自豪”,这也是个人主义在西方历史上所发挥的积极动力。

从英雄主义语义层面上看,中西方之间有着巨大差别。《辞海》《新华字典》以及《古籍汉典》等词典对“英雄主义”的定义都趋同于“才能过人、无私忘我的品质、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精神”,而西方词典的解释多倾向于“a man who is a defender or protector with great bravery and obligations”(一个有着勇敢与责任的捍卫者或保护者)。由此可见,作为社群主义为主的东方与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在英雄母题的塑造上也有着巨大差别。由于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与以国家理性至上的民族主义体认,英雄主义在“社群”优先的强势话语下,过于侧重政治概念,过于强调社群主义,忽略了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辩证关系。中国大一统文化下的英雄主义也是属于集体的,英雄们是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却将自己的利益置之度外,他们承载了太多的集体责任,包括保护大家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及国家统一等等,个人利益被忽视,个人欲望理应牺牲,个人发展应建立在集体发展之上,英雄的品格与天下苍生有着直接联系,个人永远不能凌驾于国家、集体之上,这样的英雄才值得古今世人的膜拜,于是,诸多克己复礼、舍生取义、追求以礼为主的集体主体性(仁、礼、义)的英雄层出不穷,如屈原、岳飞等等。中国传统遗留下的重集体轻个人的价值观,缺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不损害社会、他人利益范围内充分展示个人发展的一面,更缺乏互己互他的一面,容易浇灭个人热情,形成不思进取的消极影响。不是任何一类价值仅仅因为发端于社群就是好的,某些社群,比如新纳粹就会培育出广受谴责的价值观。在中国近现代发展中,社群主义作为历史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前提,个人主义更是处于国家支配下的地位,“社群主义”优先的原则长期

存在。辩证地看待西方个人主义及其为英雄主义搭出的框架,这种“框架的力量”既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夸示,也为社会环境安全有序地建立奠定了基础。如爱因·兰德所说:“每一个生命体的存在是他目的本身,而不是其他目的或他人利益的手段,正如生命是以其自身为目的。所以,人必须为了自己的缘故而生存下去,既不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也不能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7]孙中山的“建国三时期”停留在“军政”和“训政”阶段,始终未能过渡到“宪政”。虽然六法完备,却是具文而已。国难当头,依旧是集权压制民主,权威抹杀自由,社群主义自然也就凌驾于个人主义之上。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无以保障,个人发展更是无从谈起,安定的社会秩序自然也难以建立;改革开放正式标志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历史一次次证明了在社群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错误认识影响到了安定社会环境的构建,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中国在传统文化中,有家族本位主义,有国家本位主义,却鲜少谈个人,然而,如今的中国正在民主法治的道路上迅速前行,在生活方式不断转变的同时,更有精神、文化、制度上的革新。忽视个人主义的观念必须予以超越,个人权利、自由和义务既成为了国家立法的基础,也是民心所向,社会的普遍共识。人是社会产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与个人是不可分离的。社会依靠个人才能得以存在,同时,个人又须依赖社会才能生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总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实现个人自由”。战胜人性的弱点,发挥个人的才能,超越生命的价值,才是人类最科学、最神圣的精神所在。社会的主体是个人,富国、强国根本上还是为了富裕、发展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关系亟待予以深刻的反思与辨正,这是国家政法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未来的发展理念。强调发展普遍人性的英雄母题,发轫于个人主义,立足于社群主义,为个人发展开拓尽可能广阔的平台,英雄主义作为重要的承载者,寄望于哲学概念上的个人主义,同时在与追求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的周旋中保持着可能的张力和勇气,衍生出更多的英雄,汇聚成伟大的社群。

注释:

[1][2]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1、1-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4页。

[4]Barry S. Strauss and Josiah Ober. *The Anatomy of Error: Ancient Military Disasters and Their Lessons for Modern Strategis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 71.

[5]杜威:《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孙有中、蓝克林、裴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93页。

[6]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06页。

[7]爱因·兰德:《新个体主义伦理观》,《爱因·兰德文选》,秦裕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3页。

[责任编辑:钟 和]